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rxism Zhuyi Jingdian Zhuxuo Dao du Congshu*



史春风◎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rxism Zhuyi Jingdian Zhuzuo Dao du Congshu*

# 《论十大关系》 导 读

史春风◎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十大关系》导读 / 史春风编著—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8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 艾四林总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80219-893-7

I. ①论… II. ①史… III. ①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研究 IV. ①  
A84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9185 号

图书出品人 / 肖启明  
出版统筹 / 赵卜慧  
责任编辑 / 张霞

---

书名 / 《论十大关系》导读  
作者 / 史春风 编著

---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s@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 10

字数 / 115 千字

版本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河北省永清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

书号 / ISBN 978-7-80219-893-7

定价 / 2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艾四林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要求，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12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这样的课程，但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

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其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毋庸讳言，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始文本，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仅仅就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而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就计划出版120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有50卷（5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出齐后将超过60卷，《列宁全集》也有38卷。让作为非专业学者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去读这么多的原著，显然是不现实的。

有鉴于此，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研究的教授为主的编写队伍，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10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本大部头的专著；另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其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相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一点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清华园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从1955年年底到1956年春，为准备党的八大的召开并且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从1955年12月上旬起，刘少奇为准备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2个部门的负责人座谈，至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5月份以后，又约新华社、高级党校和检察院等单位谈话。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沿途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回京后，1956年2月到4月下旬，毛泽东集中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办、局）的工作汇报。在此期间，周恩来几乎每次都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几乎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重要工厂、建设工地的书面工作汇报也飞向中南海。4月下旬至5月2日，毛泽东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了四次座谈会。同一时期，陈云对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听取汇报前

夕，1956年1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956年2月至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对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以便确定党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针。在五个多月的调查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其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和统一认识，集中概括出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毛泽东同参加党的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讲道，《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sup>[1]</sup>一年多以后，他再次谈道：“那个十大关系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sup>[2]</sup>《论十大关系》，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同时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1956年12月27日，根据刘少奇同志的建议，《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泽东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这个整理稿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反映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探索，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但是较为系统的思路。毛泽东后来在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经验时，把《论十大关系》看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58年的成都会

议上，他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sup>[3]</sup> 1960年，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sup>[4]</sup> 邓小平后来也曾经指出：“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sup>[5]</sup>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sup>[6]</sup>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取得了包括《论十大关系》在内的一批理论成果，其思想和原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价值。今天，重读《论十大关系》，探寻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注释】

[1]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



[3]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第370页。

[4]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6]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0页。

# 目录

—• CONTENTS •—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艾四林 /I

引子 /III

第一章 写作缘起、基本精神和基本方针 /001

一、“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 /002

二、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 /008

三、基本精神：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012

四、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014

第二章 经济建设方针 /019

一、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发展农业、轻工业 /020

二、平衡工业发展格局，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 /031

三、加强经济建设以促进国防 /045

四、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 /053

五、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 /064

第三章 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针 /087

一、反对大汉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 /088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096

三、分清敌我，同时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106

四、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 /115

五、向外国学习，但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120

#### 第四章 意义与启示 /137

一、开启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138

二、历史局限 /142

三、教训与启示 /145



## 第一章

# 写作缘起、 基本精神和基本方针

《论十大关系》发表于1956年春，这篇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性著作的完成，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密切联系。

## 一 | “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过10年左右的恢复和重建，世界经济及科技发展进入了突飞猛进时期。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世界经济向真正现代化前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科技革命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

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借力于科技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构筑新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加强内部社会调整和政策改革，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市场的作用，促进相互间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到1950年前后，美国等国家完成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的转轨，整个西欧和日本经济已达到或超过战



《人民日报》刊登《论十大关系》

前最高水平。此后美国经济进入持续强劲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欧和日本经济亦同样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十分显著。“二战”结束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及时地把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向和平的经济建设。统计资料显示，以“二战”前1938年各国的工业生产为100计算，到1950年，苏联工业为166%，美国为233%，日本为60%，英国为131%，法国为111%，西德为92%。战后前五年的高速发展，使苏联牢牢确立了作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的地位。农业方面，从1946年至1950年贯彻“四五”计划的五年中，苏联拖拉机总数增加了30%，联合收割机增加了40%。1950年播种面积已经达到战前1940年的97%，农业总产量达到1940年的99%，其中，籽棉、甜菜、肉、蛋、奶的产量超过了战前。“四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一定改善。1947年取消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并进行币制改革，稳定了通货。五年中，国家三次降低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在城市和工人区修建住宅1亿多平方米，在农村建房270万所。文教科技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中，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加强国防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核物理、半导体、计算机和航天技术等方面有许多建树。1946年建成了原子反应堆。1949年掌握了原子弹制造技术，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0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并投入运转。当时苏联拥有的尖端技术不仅可以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抗衡，有些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同一时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6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4.8%，超过了同一时期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为 70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2%，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 1957 年所要达到的水平。在列入“一五”计划的 46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生铁、钢材、水泥、纯碱、客车、棉纱、棉布等 27 种产品的产量已达到或者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 1957 年的指标。同时，我国工业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到 1956 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实现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零的突破。农业方面，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由于国家对农业增加了投资和贷款，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仍取得了很大成绩。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 年农业总产值为 5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粮食产量为 3855 亿斤，比上年增长 4.8%，接近“一五”计划规定的 1957 年的水平。生产关系的变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6 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到 51.3%，其中现代工业比重的增长，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环境里，5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如何才能缩小差距，才能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sup>[1]</sup>，实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伟大梦想，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毛泽东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sup>[2]</sup>要改变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这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sup>[3]</sup>而此时，国际形势逐步走向缓和，这对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50年代中期，国际大势虽然依旧云谲波诡，但总的形势还是由紧张逐渐趋向缓和。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依然继续，但总的趋势还是趋向平缓。对抗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1954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达成协议，当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国际形势出现缓和的重要迹象。1954年4月至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促成了印度支那停火，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1955年4月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由中印、中缅共同倡导，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争取世界和平的独立政治力量开始逐渐崛起。

这一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中苏关系处在良好发展时期，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亚非会议后，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力在加强。1956年5月，中国同埃及建交，中国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取得新进展。与此同时，中日民间交往频繁，中美之间开始大使级会谈，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的关系也显露出一些可能改善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局势正在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sup>[4]</sup>。正如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sup>[5]</sup>周恩来在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也指出：“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慢慢感到国际形势是缓和下来了”。<sup>[6]</sup>虽然当时中共领导人仍然非常审慎地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要时刻警惕，但是从总的趋势而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世界和平的发展走向，认识到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战争可以避免。

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一直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sup>[7]</sup>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sup>[8]</sup>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将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5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随着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逐步走向缓和，中共领导人多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用时机进行经济建设的渴望。“中国是一个